

哈佛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Harvard
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

经济与社会卷

主 编 张冠梓



人民出版社



哈佛看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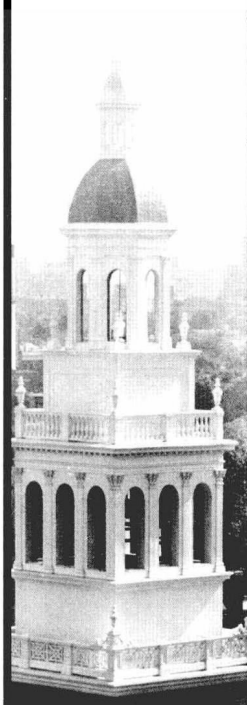
China in the Eyes of Harvard
全球顶级中国问题专家谈中国问题

经济与社会卷

主 编 张冠梓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看中国. 经济与社会卷/张冠梓 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1-008548-7

I. 哈… II. 张…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929 号

哈佛看中国——经济与社会卷

主 编: 张冠梓

责任编辑: 姬 利 陈景雷

出 版: 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人民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548-7

定 价: 4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团购电话: (010) 6523055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66204

前言

2008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之时，我只身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在美访学生活。到哈佛大学读书，这是我自打听说这所学校名字后，就开始编织的梦想，如何叩开这座“围城”的大门，这件事可以说已经成为我难以排遣的情结。期间进行过若干次努力，甚至曾经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了。迟缓却又突然，新鲜而又陌生，紧张而又亢奋，这是我到这所学校后异常复杂的感受。我深知，对于我来说，来哈佛不易，再来则更不易，一定要珍惜这一年的宝贵时光，多走、多看、多学习。

一、关于哈佛大学

到过波士顿的朋友都知道，在宽阔深沉、风光旖旎、波澜不惊的查尔斯河畔，坐落着不少世界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学校同处于剑桥城，相互毗邻，而且有趣的是，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初入我所久仰的哈佛大学，便被其颇具特色的“哈佛红”所吸引。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的各种大学排名和评比中，哈佛大学始终处在首屈一指的位置上，尽得全世界的“荣宠”。在中国，哈佛大学的名字同样妇孺皆知。特别对于那些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哈佛大学更充满了极大的号召力和诱惑力，常常成为他们为子女设立的人生的最高目标。近些年来，一些就读于哈佛或者曾经在哈佛就读的中国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不断撰文著书，介绍宣传哈佛，进一步增加了这所学校在世人心中的神圣和神奇，激发了人们走进它的愿望。

在美国，盛传着“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的说法，说明这所学校的古老和重要。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美国成为独立国家几乎要早一个半世纪。当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为了其子孙后代的幸福，仿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始称剑桥学院。1639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为了永久纪念学校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献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780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升为哈佛大学，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常被简称为哈佛。历经373年的发展，哈佛大学已经规模庞大、资产超群，常被人戏称为“哈佛帝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有很多原因。

一是学校规模庞大。全校共设有13所学院。其中本科生院两所，即哈佛学院与拉德克利夫学院；研究生院11所，即文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大学扩展部等，其中除牙医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3个研究生院设立在波士顿外，其余各学院均集中于剑桥。各院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是哈佛大学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一流的学术水准。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超过14 000人，包括超过2 000名的教授和讲师，以及7 000多名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的教员。到目前为止，哈佛大学共拥有11个研究生院、40多个系科、100多个专业的大型院校。其中，商学院、法学院、政府学院、医学院等众多学院都具有极高的声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生化学、物理学等许多学科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三是哈佛大学资产雄厚，获得的捐赠是最多的。在哈佛，每个全职教授的平均基本工资就达19.2万美元，在美国高校中遥遥领先；给学生的奖学金则每年达3.38亿美元，这些数字增添了哈佛的光环。在刚刚过去的那

个财政年（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哈佛收到的捐助金达369亿美元。哈佛大学向来出手阔绰，重金打造校园设施在所不惜。学校负责人花费2.6亿美元建一座新医学大楼眼睛也不眨一下，他们还斥巨资委托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美国老牌建筑事务所）设计一座巨型哈佛法学院副楼。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哈佛大学在经费上也开始吃紧，许多发展项目亮起了红灯，如今这所名校已经沾染了华尔街病恹恹的气息。漫步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哈佛校区，首任捐助者约翰·哈佛的雕像闪耀着光泽，但其脚下几乎被挤爆的垃圾箱却似乎透露出不妙的预兆。至于哈佛最为雄心勃勃的宏伟项目——原计划在2011年竣工、造价超过12亿美元的科学综合大楼，目前已被迫停工。由于研究院的招聘与建设均已处于冻结状态，学生、老师、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时有出现。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汇聚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哈佛大学由最早成立时的12名学生，壮大到如今的2万多名学生，规模巨大。这里面，有大学生、研究生、继续教育和夏季学校的学生，也有各种形式的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哈佛大学除了培养美国学生外，还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据报道，哈佛的学生来自世界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丰富多样性。如果你漫步在哈佛校园里，或就座于任何一个教室中，就会发现这里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来哈佛读书的学生，虽然国籍、种族、文化迥异，但他们个个成绩优异，或每科普遍优秀，或单科异常突出，或参与竞赛出类拔萃。而且，许多学生注重人文、音乐、舞蹈、戏曲、体育等素质的培养，注重管理、领导、语言、新闻报道、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的训练，可以说是多才多艺。

哈佛大学之所以能从“一叶小舟”发展成为世界高校中的“航空母舰”，原因之一在于她开创和形成了一套颇为独到的办学思想和理念。这所学校早年开设的课程以英国大学的模式为基础，但是在思想上与这个殖民拓荒地盛行的清教徒哲学保持一致。尽管它早年的许多毕业生成为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聚居地的牧师，学校却从未正式加入过某一个特定的教派。一份出版于1643年的小册子阐明了哈佛大学存在的价值：“促进知

识并使之永存后代。”另外，哈佛历任校长都坚持 3A 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这三个原则英文词第一个字母均是 A），因之各学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哈佛的校训是 “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中文意思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它是哈佛学生学习和为人的准则。哈佛的校徽拉丁文是 “VERITAS”，中文意思是“真理”。校徽的确定颇费周折，其设计草图早在 1643 年就已提出，却于无意中被搁置在文件里，沉睡近 200 年。直到 200 年校庆，校长昆西（Josiah Quincy）在寻找校史资料时，偶然发现这一图案，才把它重新介绍给哈佛师生。此外，哈佛大学各个图书馆自习墙上的箴言，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哈佛精神的一部分。读书的人累了，抬头就能看见那些给人以信心的充满哲理的话，如“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等等。如今，这些箴言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哈佛学子，甚至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恪守的“座右铭”。

与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的，是这里的研究、教学和学习风气。这里有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哈佛大学教授在教书上的认真和敬业。我在法学院、文理学院、政府学院选过一些课。教过我的每一个教授，不论是主课还是副课，都极其认真负责，要求非常严格，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得非常仔细，一个单词、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学生加班，教授也经常陪着，而且还主动给学生上小课。二是学生的认真和勤奋。去美国之前，我有个偏见，觉得在美国读书很轻松，美国大学生作业很少，考试容易，尽去玩了。去了哈佛之后，才知道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我所在的班上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各占一半，因为课程重、作业多，大家基本上都是学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去休息，上午八点钟又要准时上课，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在国内读书时，学到夜里十二点钟就觉得自己够刻苦了，可在哈佛要是这个钟点睡觉，绝对是懒学生。

正是其独到的办学理念，正是其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一流学府，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成就斐然，并且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对美国社会的经

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哈佛大学不断有影响重大的科研成果问世，如 100 多年前开始实施外科麻醉手术；20 世纪 40 年代发现核磁共振，现已广泛用于化学和医学研究；50 年代首创器官移植的新方法，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肾脏移植；60 年代提出有机合成化学的理论和技巧，并首次人工合成了维生素 B₁₂；90 年代发明新的太阳能转化电能材料；2000 年合成一种十分有效的抗癌药等等。在人才培养方面，无数优秀的哈佛毕业生，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中包括 8 位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以及无数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如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石油大王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著名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IT 巨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哈佛大学的教授中总共产生了 43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34 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中国近代以来很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学习过，包括陈寅恪、竺可桢、杨杏佛、梁实秋、梁思成、赵元任等。

谈起哈佛，不能不介绍一下它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来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这里的资料收藏实在丰富、服务设施实在齐全、服务措施实在周到。哈佛的图书馆，大小不一，算起来不下百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图书馆，即瓦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该馆建于 1638 年，是哈佛、也是美国年代最悠久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存有 1 600 多万册图书，其中包括微型胶卷、地图、图片、数据和其他资料。地上有好几层书库，地下也有好几层。另一类是与专业相关的图书馆，主要是法学院图书馆、政府学院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托玫图书馆、雷蒙图书馆、方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以及政府文献馆、哈佛档案馆、利陶图书馆等。雷蒙图书馆是大学生、研究生教学参考书图书馆，备份很足，往往其他专业图书馆借不到的，这里都能借到。霍顿图书馆是

档案图书馆，收藏很多美国名人的亲笔信件、照片、手稿。在哈佛的图书馆中，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院系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问题。在哈佛，查阅资料一般需登录和浏览哈佛大学网站。通过哈佛图书馆的 HOLLIS 网，可以查阅哈佛各馆的藏书状况。HOLLIS 网上还有各种电子杂志，看到需要的论文，可以直接下载；至于博士生的论文提要，哈佛的网上也能看到。各种学术议题，通过网上征询，都能得到满意答案。

另外，哈佛大学的各个博物馆也是哈佛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和人类文化博物馆等。哈佛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艺术博物馆之一。它收藏 15 万份艺术珍品，从古至今，从欧洲、北美、北非、中东到东南亚，范围极广。艺术博物馆分 3 座。佛格博物馆主要收集的是西方绘画、雕刻、素描、照片和印刷品，既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珍品，也有法国印象派作品。莱辛格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中欧、北欧的艺术，其收藏品主要来自德语国家。萨克勒博物馆主要收集古代亚洲和宗教艺术品，其中有中国玉器、青铜器、陶器、古画、佛教雕塑、朝鲜陶瓷、日本浮世绘、印度绘画、阿拉伯书法、波斯地毯、希腊和罗马雕塑等等。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植物博物馆、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以及矿物和地质博物馆。植物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经济植物和药用植物标本、照片、人工制品和考古资料，其中植物玻璃模型当属最稀有的收藏品。该馆共有这类模型 3 000 多个，涵盖 840 多种植物，模型精致完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哈佛考古和人类文化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学博物馆，广泛收集西半球人类文化历史的记载文献。这些博物馆与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

哈佛是许多人向往的学习和深造的地方。如今的哈佛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力，也是申请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之一。哈佛的录取率在美国是非常低的，始终停留在 10% ~ 12% 之间，但申请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每年都达到 2 万多人。许多高中成绩出类拔萃的申请者，也未必能被哈佛录取。而同时被两所名校录取的学生，75% 左右的人选择了哈佛。虽然考进哈佛不容易，但它还是为任何一个优秀的、有才华的学生提供入学的机会，录取时不考虑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对确需经济资助的学生会提供帮助。

二、关于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在哈佛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的一年时间里，我耳闻目睹了一个令中国人高兴的事实——哈佛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越来越多，在哈佛求学和教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围绕中国的研讨会、报告会、开设的讲座和课程、出版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哈佛大学院系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普遍表现出来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表现在教授（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教授讲席）、项目（有专门的中国研究项目）的体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活动、教学课程以及研究成果。从人员、项目、活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哈佛大学都堪称作为美国甚至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重镇。

其实，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是有渊源的。哈佛大学是美国第一家设置中国学的学校，也是最早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校。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譬如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方面，哈佛大学“盛产”了不少名家，出版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名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哈佛的当代中国研究也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其学术成果颇为丰厚。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开始致力于培养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造就了一批享誉全球的著名学者。70 年代初，基辛格博士在他前往中国的“秘密外交”之前，曾来到哈佛大学，倾听母校的中国研究专家们对中美关系的意见。直至今日，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对华政策研究方面，仍然发挥巨大作用。近年来，哈佛大学一些重要科系，如政府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医学系等，其主任都是在各自领域享有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数年前，法学院还首次任命了一位研究中国法律的教授为副院长。

哈佛大学现有的 11 个学院中，有 3 个学院设有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和教学的专门机构：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和法学院（Law School）。

文理学院设有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有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开设有关中国文学、历史、语言与艺术的课程。此外还有一家著名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即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1955 年，时任哈佛历史学教授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争取到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费正

清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在他之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是人文性质的。费正清把中国研究变成了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实用学问。他强调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认为美国不能直接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他去世后，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机构薪火相传，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的人数一般保持在 10~30 名之间。费正清中心有个执行委员会，是其重要的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最权威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地区研究专家组成，他们是费正清中心的学术骨干和核心成员。研究范围包括东亚各国和中国港台地区，重点在中国大陆。费正清中心学术活动频繁，学术讲座特别多，讲座内容从中国古代史到中国当代问题，从中国内地家庭社会问题到海峡两岸关系、国际关系问题，从考古探讨到戏剧、电影、小说研究，无所不有。参加者十分踊跃，尤其是热门题目，往往有的报告还没开始，会议室就坐满了，会议气氛往往异常活跃，讲者与听者有席地而坐的，有站立凝听的，也有坐窗台、热水汀的。

另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机构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通常被归在哈佛大学名下，实际上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1951 年收为国有，1952 年并入北京大学）等学校共有的汉学机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 1928 年，初始资金来源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捐赠给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遗产。作为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哈佛燕京学社久负盛名。七任社长都是汉学家，他们是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佩泽尔（John Pelzel）、克瑞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与 1955 成立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注重研究当代中国相比，它更专注于传统中国学。对此，费正清说过：“汉学家就像语言的仆人，甚至奴隶，但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将语言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实际上，中国文化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和当代，对西方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两个机构的并立使哈佛成为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

在当代中国领域，肯尼迪政府学院是近几年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肯尼迪学院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教学。当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企业政府中心（The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CBG) 的亚洲项目组下, 分为中国公共政策、中国香港的领导和中国台湾的领导者三个独立项目。

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重要机构, 设立于 1965 年。最初称东亚法律研究项目 (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 是美国研究东亚各国法律史以及这些国家与美国互动关系的最早、最大的学术项目, 目的在于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法律及法律文化。

哈佛大学还于 1997 年成立了亚洲中心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目的是更进一步地加强哈佛大学在亚洲问题上的研究, 以确保其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目前共联络了 100 多名学者到哈佛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傅高义 (Ezra F. Vogel) 教授是亚洲中心的第一任主任, 托尼·赛奇 (Anthony Saich) 教授是现任主任。

在研究项目方面, 据我所知,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医学院、政府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计学院等都有各种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项目,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法律、卫生、医学等各个方面。在经济研究方面的项目尤其多。这些研究项目不是出于一种业余兴趣, 而是具有领头人物、得到资金支持、配有专门设施、可以接受中国的研究生或者访问学者的研究项目。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项目是面向文科学者的,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项目是面向政策研究的, 环境中心的中国项目是面向环境学者的, 法学院的东亚项目是面向法学研究的, 而学校的中国项目是面向几个综合院校的。因此, 哈佛的中国研究不是少数专业、少数热心人的事情, 已经成为一个全校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学术活动方面, 哈佛的中国研究活动红红火火, 每年都有一些大型、综合型的活动。一年一次的哈佛中国评论年会是这些活动中的代表。在 2005 年的年会中, 4 个分组研讨覆盖了中国的消费、交通、能源、城市以及住房等大的热点课题。当哈佛各个领域积累起一批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时, 他们就可以开展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活动了。哈佛大学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 但是学风很重的哈佛过去侧重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 而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近年来, 哈佛大学汉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 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化现象。另外, 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学者, 过去都只用英文来作研究和交流。而现在, 在哈佛同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交流时, 大家都是用汉语来交流, 而且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正成

为哈佛学者关注的对象。

在图书资料方面，燕京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中、日、韩资料图书馆，大概也是北美最大的汉学图书馆，也是中国访问学者最常去的地方。现有藏书共 100 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微缩胶片 8 万多件，期刊 5700 多种，报纸 32 种。这些资料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但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以及有大陆出版的新地方志。自哈佛大学于 1879 年开设中文课程后，就开始收集与中国相关的图书，该图书馆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燕京图书馆借书不限，进出自由，非常方便。

在学术期刊方面，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有《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另外，费正清中心还经常有研究成果以图书和专题文集形式发表，其中有《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Series*）、《哈佛东亚专题文集》（*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和《中国论文集》（*Papers on China*）。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物为《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目前，一批在哈佛就读的中国学生们正在办《哈佛中国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

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其实，哈佛大学只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庞大人群中的一小部分。或者说，哈佛大学的“中国热”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上升，美国大学和智库对中国的研究蓬勃发展，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学府当然更是借助其在中国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持续领跑。有的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哈佛一片东方红”。其实，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各类咨询机构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可谓人数众多，难以计数。而且近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热”呈现几何级的变化，这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息息相关的。据估计，全美最好的 100 所大学中，有 300 ~ 500 位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学者。而且，不光是智库和大学，美国主要部委、大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所有大公司也都有中国项目或者中国部门。《华盛顿杂志》曾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分析员有百余人，许多退休官员如今依然活跃于美中关系学界，如芮效俭、尚慕杰、傅立民等；也有一些学者“学而优则仕”，如原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国务卿。大华盛顿地区专门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说客和咨询人员，也就是说“吃中国饭”

的人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研究热”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持续升温。如今，当你走在号称“美国智库一条街”的马萨诸塞大道，也许不经意间就会碰见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这条大道两旁的著名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离这里不远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乔治·华盛顿大学，都有中国项目，甚至有中国研究中心。盖保德（Albert Keidel）、卜睿哲（Richard Bush）、谭慎格（John Tkacik）、蓝普顿（David Lampton）、季北慈（Bates Gill）、葛来仪（Bonnie Glaser）、何汉理（Harry Harding）、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一大批有着中文名字的美国学者、教授正活跃在美国的外交学术界。需要说明一点，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大学和智库。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专业面和兴趣面最广，但往往与政策圈脱节；华盛顿和波士顿研究中国的顶尖机构最多，但就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联系最紧密，能为中美关系走向把脉而言，华府智库是其他地方没法比的。这些智库中，卡内基、布鲁金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被普遍认为是比较强的，前两者还在中国国内开设了研究分部。

应该说，“中国热”升温是好事，但对学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现实是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如何客观、公正地研究中国问题成为一大课题。我们看到，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点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密切。早在“冷战”时期，美国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苏联。现在，中国渐趋强大，美国的研究热开始转向中国，而且势头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具体细致。过去，中国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外交议题，但以前主要关注台湾、人权、贸易等比较单一的双边问题，而现在牵涉面则广泛得多。非洲、拉美、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贸易也从双边逆差发展到汇率问题、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问题；以前中国与美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并无多少合作，而今在朝鲜、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正密切合作。

如何看待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本身就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包括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跟不上中国快速变化的步伐，仍以老眼光看已经发展的中国，有些观点难免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左。

另一方面，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下，一些美国学者凭借着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了解，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亦有其强项，所思所想亦有其独到和可以借鉴的地方。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再盲从，或随意地拒斥，而是要学会以我为主，自主地、积极地思考问题。

三、关于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家

哈佛大学不仅有一流的研究机构，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人数众多，研究领域遍布各个院系的各个方面，而且代有传承，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他们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发挥着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力。

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中，最早、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费正清教授。1997 年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3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对他的学术成就和致力于中美友好的贡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费正清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来清华大学任讲师，并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48 年，他发表了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之作《美国与中国》。1958 年，该书第二版又增加了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55 年，费正清争取到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直到 1973 年。他创造的“刺激—反应”方法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此外，他还为美国近 80 所大学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从事中国学和东亚学研究的学者。他也由此获得了“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的美称。费正清所开创的中国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史学，还逐渐扩展到多学科领域。在这方面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第四版，1971 年）、《共产党中国，1955—1959 年：政策文献分析》（合编，1962 年）、《新中国和旧中国》（1977 年）、《与中国的不懈之缘：五十年回忆录》（1982 年）、《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年）》（1986 年）等。其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二是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作出

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勃斯特（Charles Webster）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三是致力于 19 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培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 100 多人。四是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外，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是哈佛大学又一位深具影响的中国学家。长期以来，史华慈一直是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常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历史和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博士委员会主席等。他是美国亚洲协会 1979 ~ 1980 年度主席。1998 年 1 月，在美国历史学会的 112 次年会上，他被授予美国历史学会“学者荣誉奖”，这是美国历史协会给予资深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史华慈的学术成就首先是对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他对中共研究的最早和有影响的成果，是他

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史华慈在著作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特点及其贡献，特别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论著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毛泽东的整个革命战略并不是向莫斯科靠拢。毛泽东在中国获得的权力，不是来自莫斯科，是靠自己争取得到的。1968年，他的第二本重要中国学著作《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在哈佛出版，这是他后来10多年对中国研究论文的结集，包括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毛泽东思想等问题的思考。这些对中国问题的解说，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西方最好的思想史专家和汉学家的研究工作的进展。史华慈中国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就是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探讨。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代表作是《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史华慈在书中对严复的翻译工作进行审慎的解读。他甚至发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有时还不如他的中文翻译者。史华慈向西方学界介绍了这位启蒙思想家探寻西方富强原因的艰辛努力。史华慈还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学术。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阐述并交流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思想经验。他认为虽然中西文化不同质，但跨文化的理解是可能的。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为这本书作序时也着重说到，假如史华慈仅仅展示一块异国土地对一个人的明显影响，仅仅尽职地记录这种远距离的思想交流，“效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他说，史华慈的这本书不是对“影响”的研究，而是“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观点“比我们原有的看法更宽更广”。《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是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也是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顶峰。史华慈毕生从事中国学教育事业。一生培养多名有国际影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1990年，柯文（Paul A. Cohen）和谷梅（Merle Goldman）主编的《思想穿越文化：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文集》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言介绍了史华慈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认为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史华慈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目标，是人类发展的问题。这是跨越时空和文化藩篱的大问题，也是20世纪人们不断关注的问题。在史华慈看来，中